

周兴樑 著

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与革命实践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周兴樑，江西赣县人。1944年生，1968和1981年先后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教授、校社会科学处处长。长期从事孙中山与民国史研究，著述颇丰：专著有《廖仲恺和何香凝》，合著有《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年谱长编》、《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运动史》、《国共合作史》、《国共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研究》（主编之一）等，参加《孙中山辞典》与《宋庆龄辞典》的编写及《孙中山全集》第五、六卷的编辑工作；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文史哲》、《中山大学学报》及《中山社会科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序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巨人。剧变的 20 世纪中国曾产生过三位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伟人，第一位就是伟大的爱国者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是他，最早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召唤，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正规阶段，为近代中国的腾飞开启了闸门。孙中山不仅受到全球炎黄子孙的普遍尊敬，而且还获得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广泛认同。他的伟大革命思想，体现了人类追求真理和企求进步的共同趋向，他的丰富革命实践，表现了一代革命家的崇高品格。他堪称为人间楷模。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的孙中山研究方兴未艾。而在我国学术界，孙中山研究近年来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我有幸最早读到周兴樑同志的新作《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与革命实践》，感到十分欣慰与高兴！

兴樑同志与我相识多年，他于 60 年代末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师承陈锡祺教授，并在这位学界名宿的指导下开始了孙中山研究的工作。十几年来，兴樑同志参加过陈教授主编的《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等书的编纂工作，且与林家有教授合著《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及《国共合作史》等书；而他自己则更是经常潜心伏案，长期辛勤耕耘，在一系列有关孙中山研究的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不少优秀学术论文。在当前我国研究孙中山的中青年学者中，兴樑同志无疑是十分勤奋又颇有成就与影响的一位，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重视和好评。

这本初次结集选入的 20 多篇论文，只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主要部分，却不乏其在各个学术问题上的代表之作。

兴樑同志的这部学术论集，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视野宽阔，研究涉猎的范围广泛，是其特色之一。该书所选入的五个方面的论文，既有对孙中山与中西方文化及中外人物关系的探讨，又有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运动及首次国共合作问题的研究，还有对孙中山统一及建设祖国思想实践的论述，它们结纂成一书，范围几乎涉及孙中山一生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革命思想活动及其内政外交实践。勇于和善于开拓，观点方面颇具新见；是其又一特色。该书在孙中山是否为儒家文化的传人？他的施政方策对民初各省有无影响？他在“宋案”后对袁氏之态度如何？他究竟是“容共”还是“联共”？他生前与蒋介石有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持有自己的见解，从而解决了前人未曾涉及或尚未解决的一些学术问题。资料丰富、学风求实、立论中肯，是其特色之三。据粗略统计，该书共征引书籍资料 220 多种（册），其中不少来自当时的报刊与档案资料。每篇文章皆旁征博引，以史实立论，凡所论证皆一步一个脚印，无高论炫人或浮泛弘廓之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这是保证论集的科学性的关键，也是我国社科研究的主要优势所在。总之，我认为这本论集是兴樑同志近年来的又一部力作。可以预期，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将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并对孙中山的学术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毫无疑问，兼具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孙中山研究决不应当满足于现有的研究成果；继续深化与拓展孙中山研究既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目前形势对我们的要求，只有更深入全面地进一步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实践及其活动时代与周围人物，才能更为趋近历史真实地反映这位世纪伟人的风貌和心态。我热切地

期望兴樑同志今后更加锲而不舍，不断推出更多的研究新成果。

在兴樑同志这一力作付梓之际，我固嘉其行，复庆其成，故敢不揣浅陋爰志数语为之序。

张 磊

1998 年 4 月

前 言

如果从1981年本人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算起，我在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从事孙中山研究工作已有17年了。

这些年来，我参加过所里承担的、由业师陈锡祺教授主编的《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年谱长编》的编纂工作，并与林家有教授合著有《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及《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等书，而更多的时间是我自行按计划对孙中山及其有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研究。收入这本学术论集的22篇论文，除一篇尚未发表外，其他21篇分别公开发表在《历史研究》、《文史哲》、《中共党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孙中山研究论丛》、《贵州社会科学》，及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的《中山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上。其中多篇论文发表后，又被《中国历史学年鉴》、《人民日报》（海外版）、《社会科学报》、《大公报》（香港）及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的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等摘引评介或全文转载。这本论著所收入的论文，占了我十几年来有关孙中山研究论文的大部分。可以说，它们大致能反映出本人在孙中山研究学术道路上不断行进的足迹。

众所周知，孙中山是一位跨世纪的、享誉全球的伟大历史人物。他活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整个光辉的革命生涯是多姿多彩的。孙中山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又是中国资产阶级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实践家。这本论著选入的论文，力图对孙中山伟大的革命思想与丰富的革命实践，进行实事求是的、多方位的考察与探讨。因

此，我觉得将它取名为《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与革命实践》，是恰当的。

这本著作的论文，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一）孙中山与东西方思想文化；（二）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运动；（三）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四）孙中山与祖国的统一及建设；（五）孙中山与国内外人物的关系。由于论集的篇幅所限，原拟收入的关于孙中山研究述评及史实考订方面的文章，只好割爱删去。上述这五个方面的论文，涉猎到的研究范围较广，包含了关于孙中山政治学说的文化思想渊源，他创立的兴中会与同盟会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开创和领导作用，民初他在大总统任上的施政方策对广东民主共和政权的影响，他在“宋案”后对袁世凯的政治态度，他的三大革命政策的内涵及其实施情况，他晚年是“容共”还是“联共”，他的和平统一祖国及在中国实现全面近代化之思想与实践，以及他与西方基督教徒、与部属蒋介石及与美国友人的关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论文，分别对孙中山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革命思想与实践业绩，作了历史的、多角度和多层面的论说，并在一些学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期抛砖引玉而给读者新的启发，有助于今后孙中山研究的深入开展。

孙中山是数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杰出的民族英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他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腾飞开辟了道路。他的伟大思想与人格，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and 优秀品德，是我们十分宝贵的政治遗产；他勇于开拓进取的革命实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与理想追求。历史在发展前进，孙中山的伟大革命思想与实践，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价值和意义。无论现在或将来，进一步加强对孙中山的研究工作，都有其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我希望这本论著

的出版发行，能激励人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孙中山那爱国爱民、振兴中华、追求真理、忠于正义事业、关心人类共同进步的伟大精神。

历史人物的研究，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向人们展示其历史真貌，同时还应以当代人文精神去引导人们进行“以史为鉴”的反思，做到古为今用。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都要求我们不断拓展与深化孙中山的研究。本人作为孙中山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和还有很多的研究工作要做。今后在孙中山研究方面，我决心更加锲而不舍，努力辛勤耕耘，不断用新的研究成果来回报时代与社会，进一步为繁荣我国史学界的孙中山研究事业出一份力。

目 录

序	张磊
前言	(4)

孙中山与东西方思想文化

吸取、融贯、创新

——略论孙中山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	(3)
融铸东西方思想文化而成的三民主义	(21)
孙中山与西方基督教	(40)
儒家的民本主义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	(61)
孙中山复兴亚洲思想略论	(85)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运动

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揭开了辛亥革命运动的序幕	(107)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与武昌起义	(142)
孙中山民初的施政方策与当时广东军政府的实践	(177)
“宋案”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	(208)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论孙中山在首次国共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219)
论孙中山晚年“联俄”	(234)
略论孙中山“联共”的原因和目的	(267)
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与广东工农运动的高涨	(289)

试论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具体内涵	(314)
-----------------------------------	-------

孙中山与祖国的统一及建设

冯玉祥北京政变与孙中山北上谋和平统一祖国.....	(339)
论孙中山的韶关北伐.....	(354)
孙中山与国民会议运动.....	(366)
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思想与实践.....	(393)

孙中山与国内外人物的关系

试论 1900 年前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	(417)
略论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	(435)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越南的华侨及志士.....	(469)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美国友人.....	(494)

后记.....	(513)
---------	-------

孙中山与东西方思想文化

吸取、融贯、创新

——略论孙中山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

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近代中国贯通中西方文化的巨人。他不仅注意吸取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而且又十分尊重与珍惜中国数千年固有的传统文化。在一生救国救民的奋斗中，他立足于“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①，“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②，创立了合乎时代与人群需要的、先进的政治学说三民主义，用于指导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本文拟就孙中山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

孙中山在青少年时代，曾接受过 10 多年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打下了较深厚的“西学”基础。1894 年秋，他在上书清朝权臣李鸿章时自我介绍谓：“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

①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560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60 页。

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① 在后来领导辛亥革命运动和反袁护法斗争时，孙中山长期奔走与生活在欧风美雨的异国他乡，对于西方之资本主义文化有深入一步的考察与认识。他所受的教育和与常人不同的社会阅历，使他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超乎前人及同时代的人。

孙中山以宽阔的胸怀面对现实，从世界文化的范围来考察问题。他当时承认“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②；在封建专制之下，具有古老文化的中国在近代落后了，同欧美西方国家相比较：“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不如彼者亦多。”^③ 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所致：“政府一天专制一天，不是焚书坑儒，便是文字狱，想种种办法去束缚人民的思想，人民那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④ 二是闭关主义、固步自封造成的：“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孤立之性。故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⑤；三是实业不发达，导致物质文明不如西方：“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⑥

孙中山基于上述认识，明确地提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8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4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

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①，“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以便使中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转弱为强，易旧为新”^②。他指出：“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③他强调：“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④；“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现革命，当然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⑤的确，孙中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师法者。他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不但主张学习应用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等来建设中国的物质文明，而且更强调要取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其来取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制度，开创近代中国政治与物质文明的新纪元。

孙中山在主张取法吸收西方文化精华部分以为己用的过程中，既反对盲目的排外，更反对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他指出：对西方文化持开放政策，“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⑥。他认为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都是错误的。他批评“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页。

④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8页。

⑤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0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

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①。他强调指出：取法西方文化时，必须考虑到适合于中国的“民情国史”，“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洲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②孙中山对一些华人留学外国时，“便自称为什么‘佐治’、‘维廉’、‘查理’，连中国的姓名也不要”的做法，及对有些人留学之后便连“中国的话也不会讲，……厌弃中国，……逢人说起国籍来，总不承认是中国人”的行径^③，都表示憎恶与痛恨。他对一些留学生只知一味崇拜洋教条，而“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的不良倾向，则表示“甚耻之”^④。

孙中山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方，总是谦逊地乐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他对受到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而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持欢迎态度，并给予高度的赞扬。他说：“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还指出：“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全党同志应为“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9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3～76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8～539页。

④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南京国史馆，1947年版，第48页。

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而努力。^①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推动下，孙中山关注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文化，开始逐步转向接受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在此同时，他通过总结辛亥革命以来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以往师法的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产生了某些怀疑，进而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有所批判和揭露。这期间他多次指出：“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科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②孙在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提高了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还进而斥责欧美列强的“霸道文化”。1924年冬，他北上途经日本时指出：“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③同时他还批评近邻日本不该在“思想方面尽步欧美人之后尘”^④，并期望已经“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之日本，不要再做“西方霸道的鹰犬”^⑤。

孙中山在他的晚年，热情赞扬列宁所阐明的关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思想，将之视同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与“王道文化”。他指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不过如此而已，有何可畏？”“赤露

①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210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6～667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5页。

④ 《大元帅抵津后之言行录》，广州《七十二行商报》，1924年12月22日。

⑤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9页。